

技术异化与人的本真存在

——庄子与海德格尔的对话

宋 鑫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6日

摘 要

现代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塑造着人的生存样态。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陷入深层异化——人不再是技术的主人, 而沦为系统中的一个功能性环节。这一困境并非现代独有, 战国时期庄子借抱瓮老人之口提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将技术批判从工具层面推进到存在论层面; 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则以“座架”(Gestell)揭示现代技术将一切存在者化约为“持存物”(Bestand)的本质。本文在二者之间建立跨时空对话, 分析其批判技术异化与回归本真存在的路径——庄子的“心斋”、“坐忘”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庄子以“忘”为方法, 海德格尔以“思”为路径, 二者殊途同归, 共同指向对工具理性单一范式的超越, 为技术时代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提供了跨文化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

技术异化, 本真存在, 庄子, 海德格尔, 座架, 心斋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the Authentic Human Existence

—A Dialogue between Zhuangzi and Heidegger

Xin So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August 15,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7,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6, 2026

Abstract

Modern technology shapes human existence with unprecedented depth. While bringing convenience, it also entangles people in profound alienation—humans are no longer masters of technology

文章引用: 宋鑫. 技术异化与人的本真存在[J]. 哲学进展, 2026, 15(9): 228-233.

DOI: 10.12677/acpp.2026.159442

but have become functional components within a systemic apparatus. This predicament is not unique to modernity.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Zhuangzi, through the figure of the old man at the well, asserted that “one who has mechanical devices must have a mechanical heart,” elevating technological critique from the instrumental level to the ontological leve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idegger employed the concept of Gestell (enframing) to reveal how modern technology reduces all beings to Bestand (standing-reserv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ross-temporal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thinkers, analyzing their critiques of technical alienation and their paths toward returning to authentic existence—Zhuangzi’s “fasting of the mind” (xinzhai) and “sitting in forgetfulness” (zuowang), and Heidegger’s “poetic dwelling.” Through comparison,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Zhuangzi takes “forgetting” as his method, while Heidegger takes “thinking” as his path; despite their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y converge on the same goal—transcending the monolithic paradigm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gether, they offer cross-cultural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how to become a whole human be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Keywords

Technical Alienation, Authentic Existence, Zhuangzi, Heidegger, Gestell, Fasting of the Mind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技术时代的生存困境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技术深度塑造的时代。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再到今天对算法操控的普遍焦虑，技术异化始终是现代性的核心议题。然而多数批判停留在经验层面，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追问：技术在存在论层面改变了什么——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做什么，更改变了我们是什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庄子与海德格尔提供了远超时代的洞见：庄子以“机心”揭示工具逻辑对人的反向塑造，海德格尔以“座架”揭示现代技术的存在论本质。在展开比较之前，有必要说明将庄子的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并置的合理性与界限。二者的根本差异不容回避：庄子的“道”是化育万物的宇宙大化之源，其精神在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使存在者得以显现的澄明之境，其追问存在之意义。道指向天人同体的浑全境界，存在则始终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相连。若将二者简单等同，既遮蔽了道的宇宙论厚度，也消解了存在的现象学精微。然而，承认差异并不意味着比较无效。本文的比较聚焦于一个功能性层面：技术如何遮蔽人的本真存在，人如何回归本真。二者在技术批判的深层逻辑上呈现惊人的结构相似性——都追问工具逻辑如何封闭了人与世界本真相遇的可能性；在回归路径上则展现出“忘”与“思”的互补张力。本文的比较是功能性的对话，而非本体论的等同——旨在让两种思想在共同问题域中相互照亮，而非在理论根基上强求统一。本文从“机心”与“座架”出发，梳理二者回归本真存在的路径，追问在技术逻辑日益精密的今天，一个完整的人何以可能。

2. 庄子的技术批判：机心与道

2.1. 抱瓮老人：从机械到机心

《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看似平常、实则深远的寓言。子贡南游于楚，在汉阴遇见一位老丈正费力地抱着瓦瓮从井中取水浇灌菜地。子贡好心地建议他使用桔槔——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汲水装置，“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沚汤”，效率可提高百倍。老人的回答却出人意料：吾闻之吾师，有

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个回答在哲学史上有开创性意义。它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将技术批判从效用层面(技术有用吗)推进到存在论层面(技术会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老人并非不知道桔槔更高效——恰恰相反，他“非不知”——他拒绝的理由是存在论的而非功利的([1]: p. 192)。细察老人给出的因果链条：起点是技术物(机械)，中间经过行为习惯(机事)的积淀，最终形成一种特定的心智结构(机心)。“机心”是对这个链条的命名，也是一种批判：它不是简单的道德贬义，而是精准地指向一种将一切事物视为可计算、可操控、可利用之对象的思维方式。人一旦习惯用杠杆省力，就会不知不觉用同样逻辑看待人际关系、看待天地万物——什么东西为人所用？什么路径效率最高？投入产出比如何？“纯白不备”意味着心灵丧失未被功利逻辑浸染的原初质朴状态；“神生不定”描述的是单一逻辑支配心灵后的焦虑与漂泊无依；“道之所不载”则是最终判决——这样的生命已丧失承载道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收尾。子贡听了这番话后“瞠然惭，俯而不对”。这位孔门高足——以经商闻名、最擅长“计算”的弟子——在抱瓮老人的存在论洞见面前感到了深刻的不安。庄子的叙事姿态很清楚：功利主义智识在面对道的智慧时，应当感到羞愧。

2.2. 庖丁解牛：技术作为道的通路

如果仅读到抱瓮老人，很可能将庄子误解为反对一切技术的卢德主义者。但《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文惠君赞叹：“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的回答将自己的技术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用刀十九年，“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1]: p. 145)。关键不在于熟能生巧——而在于他的技术运作方式不依赖对象化的认知。“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意味着他不再将牛当作一个外在的、需要分析和拆解的对象，而是与牛的结构达成了一种前反思的、全身心的默契。“官知止而神欲行”——感官的认知功能退场之后，精神运作反而更加流畅自由。这是庖丁的刀不同于桔槔的根本所在：后者以效率逻辑抽象了人与水的关系，前者则在“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中通达了道。技术在这里不是征服对象的手段，而是与事物本然结构协同共舞的方式。庄子技术批判的精微由此显现：他不反技术本身——他反对的是一种将万物(包括人自身)仅仅视为可操控之物的“机心”态度。一旦这种态度固化为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唯一方式，“道”的维度就关闭了，人就再也无法以非功利的方式感应世界的整全。

2.3. 心斋与坐忘：回归本真

如何从“机心”回归道的通达？庄子在《人间世》和《大宗师》中分别提出了两个核心方法：心斋与坐忘。《人间世》中，颜回请教孔子何为“心斋”。孔子(庄子的孔子)回答：“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 p. 53)。心斋是逐步减损的过程：从感官层面(耳)退到意识层面(心)，再从意识退到前意识的虚灵状态(气)。“气”被定义为“虚而待物者”——不是充实的实体，而是一种纯粹的接受性，一种不预设任何认知框架的敞开。“唯道集虚”：道只在虚空中汇聚，一个塞满了机心算计的心灵，没有道可以容身的空间。《大宗师》中“坐忘”更为彻底。颜回依次忘掉仁义，再忘礼乐，最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1]: p. 119)。这是一个越来越深的减法——忘掉社会规范、忘掉文化制度、最后连身体存在感和对象化认知本身也放下。“忘”不是遗忘或丧失，而是一种主动的放下执着。“离形去知”之后的状态是“同于大通”：与道的无限运作合一。这不是消极的虚无，而是积极的敞开——减去人为造作之

后，道的自然运作恢复。将心斋与坐忘放回技术批判语境，“忘”的摆脱逻辑就清楚了。技术异化的根源是“机心”——充满功利算计、将一切对象化的心智。而摆脱此心智不是去获得某种新知识或新技能，而是减去造作，让心灵恢复“虚而待物”的本真状态。道家将这种回归后的存在样态称为“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1]: p. 2)。“游”是自由无羁的、不被任何特定目标所限定的在世界中的徜徉。这正是庄子心目中本真存在的样态：不是效率最大化的人，而是在道的无限中自在遨游的人。

3.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座架与存在遗忘

3.1. 技术的本质：从解蔽到持存物

1953年，海德格尔在慕尼黑发表题为《技术的追问》的演讲，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论断：“技术的本质绝不是什么技术性的东西”([2]: p. 74)。他首先检讨了两种流行定义——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工具论)和技术是人的行为(人类学)——认为二者虽然“正确”，却并未触及技术的“真实”本质。那么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海德格尔的回答出人意料：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eine Weise des Entbergens)。在古希腊，技艺(techne)与知识(episteme)同属“认识”的范畴——都意味着对某物“精通、理解”，都是将事物带入无蔽状态(aletheia)的活动。一个木匠将木材解蔽为桌子，正如几何学家将三角形解蔽为定理——两者都是让某物作为某物显现出来。但海德格尔指出，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在解蔽方式上发生了根本断裂([2]: p. 4)。古代技术(风车、木桥、农耕)“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风车利用风力却不储存风力，木桥架在河上，河流依然可以是荷尔德林诗中那条承载神话的莱茵河。现代技术则完全不同：它将一切存在者解蔽为“持存物”(Bestand)——随时待命、可被订造和调配的资源。莱茵河不再是荷尔德林的莱茵河，而成了水力发电站的“水资源”；土地成了“矿区”；人成了“人力资源”。一切落入无差别的可利用性之中([2]: pp. 12-13)。

3.2. 座架：人也被摆置

如果现代技术仅将自然物变为持存物，那只是技术异化生化的一隅。更令人不安的另一半是：人自身也被卷入这个逻辑。海德格尔用“座架”(Gestell)命名这种双向的摆置——“那种摆置着人的促逼，它逼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解蔽为持存物”([2]: pp. 14-17)。在常识中我们以为人是技术的主人——人发明技术、使用技术、控制技术。但海德格尔指出，在现代技术的本质中，人首先被座架“征用”了。我们检查睡眠数据以优化效率，用绩效指标量化工作价值，在社交媒体上将生活包装为可消费的内容——在所有这些行为中，我们同时是订造者与被迫订造者([2]: pp. 19-20)。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核武器或环境灾难——那些只是表层后果。真正的危险在于：座架驱除了所有其他解蔽方式的可能性。当一切都被解蔽为持存物，人就遗忘了还有其他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诗性的方式、沉思的方式、让事物在自身丰富性中显现的方式。这便是“存在遗忘”(Seinsvergessenheit)：人沉沦于存在者层面——沉迷于操控、优化、生产、消费——却完全忘却了“存在本身”的意义：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不是一无所有([2]: pp. 26-28)?

3.3. 诗意栖居：救赎的可能

但海德格尔并非技术悲观主义者。他借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出拯救”([2]: p. 42)。救赎的关键在于两个概念：诗意(Dichtung)与栖居(Wohnen)。“诗意”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美学范畴，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让……显现”的原初方式。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指出艺术的本质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在《……人诗意地栖居……》中，他借荷尔德林阐发：诗意是“尺度”的采

取——“人用神性度量自身”，让人知晓自己在大地上、天空下的位置。与技术的“订造”相反，诗意的度量“让事物如其所是”，不以操控利用为目的([3]: p. 38)。栖居则是海德格尔对本真存在的正面表述。栖居不是住房紧缺意义上的居住问题，而是“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他以“四重整体”(Geviert)描述栖居的结构：大地(承载者)、天空(节律与敞开)、神圣者(神性召唤的尺度)、有死者(直面死亡而获得的本真性)——栖居即是守护这四重维度，不让任何一重被化约为持存物的逻辑([3]: pp. 148-156)。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明确拒绝技术卢德主义。他写道：“对技术的盲目攻击是愚蠢的，把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之作是短视的”([4]: p. 53)。危险不在于技术的存在，而在于它僭越了边界。救赎不是抛弃技术，而是让技术回到边界之内，同时保持对其他解蔽方式的开放。为此，他区分了“计算性思维”(rechnendes Denken)——盘算、规划、优化的座架式思维——与“沉思之思”(besinnliches Denken)——对存在保持惊异、追问和感恩的能力。“思”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与“谢恩”(Danken)词源关联：真正的思是对“存在给出自身”这一原初馈赠的感恩性回应([5]: pp. 139-244)。技术使人哑然失语的处境中，守住“思”与“诗”，就是守住人的尊严。

4. 对话：异曲与同工

4.1. 批判的相似性

将庄子的“机心”与海德格尔的“座架”并置，二者呈现出如下相似性。第一，二者都将问题定位在存在论层面。庄子不满足于批评桔槔“让人变懒”(经验后果)，而是追问使用桔槔是否封闭了“与道合一”的可能(存在论后果)。同样，海德格尔不满足于批评技术的环境破坏(经验后果)，而是追问技术是否使人遗忘了“存在的意义”(存在论后果)。批判的深度在于触及的不是技术做了什么坏事，而是技术改变了我们是什么。第二，二者都揭示了工具逻辑对主体的反向塑造。庄子从“机械”到“机心”的链条表明：人制造的工具反过来制造了人的心智。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同样指出：人用来摆置存在者的框架，反过来也摆置了人自身。人-技术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主人-工具”关系，而是一种循环互构——人往往是其中被改变得更多的那一方。第三，二者都将异化的核心诊断为世界丰富性的丧失。“纯白不备”与“存在遗忘”指向同一种病症：单一的存在模式排斥了其他可能性，人丧失了以多种方式与世界打交道的能力。第四，二者都诉诸某种前技术的原初状态作为批判性参照——庄子的“古之真人”、海德格尔的前苏格拉底希腊——作为解构现存在单一技术逻辑之理所当然性的杠杆[6]。

4.2. 路径的差异：忘与思

解决路径上，二者展现出意味深长的差异。庄子取减法——以退为进。心斋是“忘”：忘记以感官和心智去抓取对象，退回到“虚而待物”。坐忘是更彻底的“忘”：忘掉社会规范(仁义)、文化制度(礼乐)，最终连身体和自我意识也一并放下。“得意而忘言”(《外物》)意味着语言也只是工具——捕鱼的筌、捉兔的蹄，得到意义之后，“忘”掉工具是自然的结果。“吾丧我”([1]: p. 16)——丧掉那个充满算计和执着的“我”，才能与天地的自然运作重新合拍。在所有这些表述中，“忘”不是消极的缺损，而是积极的回归——回归到被“机心”掩盖之前的本然状态。庄子暗含的信念是：本真存在不需要被“创造”或“获得”，它只需要被恢复——拨开云雾后太阳自然显现。海德格尔取转化——在思的内部转向。他不抛弃思，而是从“计算性思维”翻转为“沉思之思”([4]: pp. 46-47)，让思与“诗”结盟。沉思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接受性——不是主体对客体的主动建构，而是一种“让……存在”的态度。在计算性思维中，人把自己当作意义的赋予者；在沉思之思中，人意识到自己首先是意义的接受者。在语言立场上，庄子深怀警惕(“得意而忘言”)，海德格尔则寄以厚望(“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不是工具，而是存在显现自身的场所([3]: p. 129)。从气质上看：庄子洒脱——终极意象是“游”，在道中逍遥无羁，不把任何形

式当作终极。海德格尔庄重——终极意象是“栖居”，人在大地上意味着责任、逗留与守护，而非自由的飘逸。

4.3. 殊途同归

庄子与海德格尔所提路径均指向非对象化的存在方式——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与海德格尔“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存在”，都呼唤不以控制为目的的与世界的关系。二者都不主张放弃技术，而是主张技术有其边界——庄子反对的不是桔槔而是“机心”对心灵的全面殖民；海德格尔追求的是“同时说是与否”：在必要时使用技术物，却不被其支配。更耐人寻味的是，海德格尔晚期在讨论如何与技术共处时，使用了极具道家气质的词——Gelassenheit (泰然任之)。技术物可以进入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对它保持“既不执着也不拒斥”的态度——被使用时就位，不使用时退入背景。这与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 ([1]: p. 318) 几乎完全一致。庄子的“游”提供了超越性——不被系统逻辑定义自身价值的能力；海德格尔的“栖居”提供了沉入性——在日常有限的生活世界中开掘意义深度。游而不栖，自由沦为虚无；栖而不游，扎根沦为禁锢。

5. 结语：在技术时代成为完整的人

庄子和海德格尔的共同洞见在于：技术异化的根源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所催生的特定存在理解方式遮蔽了人之本真存在的其他可能性。因此，回归本真并不意味着摒弃技术、退回前现代状态，而是重新开启被机心与座架所封闭的存在维度。这一判断在当代技术条件下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例如，就人工智能而言，其对人类创造力的模仿——从文本生成到图像与音乐创作——将“艺术是否可被计算”这一存在论问题推至前台。海德格尔将诗界定为存在论意义上的解蔽方式，即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依此视角，AI 所能完成的符号组合即便符合一切形式规则，仍无法等同于本真的艺术创作，因为后者涉及人之栖居——在有限性中为存在开辟意义世界的能力，而非对既有符号的统计性重组。正因如此，守护诗、艺术与沉思并非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在计算逻辑日益扩张的条件下为人保留一块不可量化、不可优化的意义领地。只要人还保有一种技术逻辑无法穿透的维度，人就还不是持存物，人的存在就仍有未被规定的可能。

参考文献

- [1] 方勇, 译, 注.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庄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2] Heidegger, M.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Lovitt, W., Trans., Harper & Row.
- [3] Heidegger, M. (2001)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Hofstadter, A., Trans., Harper Perennial.
- [4] Heidegger, M. (1966) *Discourse on Thinking*. Anderson, J.M. and Freund, E.H., Trans., Harper & Row.
- [5] Heidegger, M. (1968) *What Is Called Thinking?* Gray, J.G., Trans., Harper & Row.
- [6] 张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